

學術著作 ◆ 大專用書

國際政治學 ——歷史與理論

王逸舟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際政治學

—歷史與理論

王逸舟 著

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印行

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

編著者／王逸舟

責任編輯／鍾翠貝

校對者／林美伶

出版者／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0598 號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 106

和平東路二段 339 號 4 樓

電話：(02)27055066（代表號）

傳真：(02)27066100

劃撥：0106895-3

網址：[//www.wunan.com.tw](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發行人／楊榮川

中部門市／五南文化廣場

地址：台中市中區 400 中山路 2 號

電話：(04)2260330

排版／龍虎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製版／欣緯照相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三聖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裝訂／一絃裝訂行

中華民國 88 年 2 月初版一刷

ISBN 957-11-1723-4

基本定價 11 元

（如有缺頁或倒裝，本公司負責換新）

目 錄

上 篇 歷史：非線性的擴展

第一章 理論大廈的零散磚塊.....	3
第一節 國際關係的萌芽和擴展 • 3	
第二節 國際政治學的思想軌跡 • 7	
第三節 早期學說的特點與局限 • 26	
第二章 從理想主義到現實主義.....	35
第一節 新世紀前葉的學科進展 • 36	
第二節 威爾遜精神與理想主義 • 46	
第三節 回歸現實的兩位思想家 • 53	
第三章 科學主義挑戰歷史主義.....	73
第一節 傳統現實主義的全盛期 • 74	
第二節 經驗主義交會行為主義 • 84	
第三節 卡普蘭的國際系統學說 • 96	
第四節 科學主義的成就與弱點 • 107	
第四章 全球主義與「百家爭鳴」——多元化的深度擴展(一).....	117
第一節 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擴散 • 118	
第二節 國際法和集體安全學派 • 131	
第三節 新馬克思主義各種分支 • 138	
第四節 自我改進的新現實主義 • 145	

第五章 非實證主義的思維空間——多元化的深度擴展(二)····· 157

第一節 真實的歷史和思維的結構 · 158

第二節 探索的歷程與新人的崛起 · 163

第三節 理論的批判和批判的理論 · 172

第四節 後現代思想的力量與缺陷 · 180

第六章 後兩極時代的理論思考——多元化的深度擴展(三)····· 195

第一節 國際關係的歷史性變化 · 196

第二節 蘇聯解體的自由主義觀 · 202

第三節 新現實主義的文化視角 · 217

第四節 研究方法的進一步融會 · 224

下 篇 理論：不均勻的支點

第七章 結構現實主義····· 243

第一節 結構主義的創意 · 244

第二節 兩極意識的固守 · 253

第三節 方法論的特性 · 262

第八章 國際社會理論····· 273

第一節 英國學派的掃描 · 274

第二節 國際社會的架構 · 279

第三節 思考軌道的延伸 · 285

第九章 國際制度理論····· 297

第一節 國際合作的命題 · 298

第二節 理性主義的預期・306

第三節 制度選擇的範圍・312

第十章 國際周期理論..... 325

第一節 國際周期現象・325

第二節 三種周期理論・331

第三節 若干評價簡述・344

第十一章 學習進化理論..... 353

第一節 人的認知過程・354

第二節 政治中的應用・361

第三節 進化式的學習・369

第十二章 結構自由主義..... 381

第一節 西方秩序的透視・382

第二節 蘇聯巨變的讀解・389

第三節 國際領導的新說・397

第十三章 國際政治經濟學..... 407

第一節 IPE的緣起・407

第二節 三種理論模式・412

第三節 兩個探討角度・425

第十四章 生態政治論..... 441

第一節 生態政治的崛起・442

第二節 傳統思維的動搖・445

第三節 道德尺度的評判・458

第十五章 女權主義..... 467

第一節 性別歧視的現象 • 468

第二節 女權主義的批評 • 473

第三節 跨越舊有的藩籬 • 482

人名、地名和專有名詞索引 / 493

致謝 / 510

上篇

歷史：
非線性的擴展



第一章

理論大廈的零散磚塊

內容提要

第一節 國際關係的萌芽和擴展

第二節 國際政治學的思想軌跡

第三節 早期學說的特點與局限

國際政治學是一個比較晚近才出現的社會科學門類。它真正被作為一種理論來加以系統和細緻的研究，不過是本世紀的事情；確切地講，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①。而國際政治理論研究領域的繁榮興盛，更晚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換句話說，國際政治學被視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至多不過是幾十年的時間。國際政治學理論研究的（相對）不成熟，是與這個時間歷程相關的。

系統分析的缺乏，並不意味著思想的空白。當代國際政治學的「前史」，是歐美地區，尤其是西歐主要國家（英法德義荷等）的某些思想家、學者和戰略家，在本世紀以前的三、四百年內，向這門學說的「理論大廈」貢獻「零散磚塊」的歷史，是思想火花不斷迸發、觀點方法長期積淀的歷史。

第一節

國際關係的萌芽和擴展

回溯國際政治理論研究的歷史，首先須簡要考察研究對象本身的形成過程。

衆所周知，國際關係主要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間的關係。但民族國家並非古即有之，它是一個近代的現象，是人類在其漫長歷史的最近幾百年才形成的概念。雖然有一種觀點認為早在古代希臘已有國際關係存在²；但嚴格地講，那時的希臘城邦國家（city-states）之交往政治（包括軍事鬥爭和某種形式的「外交」等），只限於同一種族區域的不同政治實體的城市公民之間（非公民的城市居民被禁止賦予參加任何形式的政治交往；儘管從現今的定義上說他們當然也是「民族」的成員），這種關係至多可以稱為「城邦（政治）關係」，而不是現在所談論的「國家（間）關係」（inter-national）的關係。「民族」（Nation）及其觀念在古代世界是不存在的。同樣情形亦存在於古代中國或印度。

在中世紀（the Medieval Period）晚期，隨著文藝復興運動（Renaissance）的出現，義大利各城邦國家在對外交往中（尤其是日益擴大的海上貿易），趨於成為更加統一的政治實體。在佛羅倫斯（Florence）、威尼斯（Venice）和米蘭（Milan）等主要城邦國家，一種建立整體的義大利民族性（the Italian Nationality）的思想抱負，在少數有遠見有野心的政治思想家心目中湧動。威尼斯人繼承拜占廷帝國（Byzantine Empire）的「外交」傳統，創造了歐洲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現代外交模式——國務活動家行動目標的典型公式：首先，爭取獨立（independent）；其次，尋求霸權（supremacy）；最終，作為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生存（survival）。現在義大利所在的區域，則事實上成為現代國家歷史上外交縱橫的最初場所——這不僅指最早建立了互換大使並相互承認作為各自國家的全權代表的制度，使外交生涯成為一種時髦高尚的追求；而且，以威尼斯人為典型的義大利各城邦國家，在發展對外貿易和對外政治交往中，形成了歐洲最早的以權力和利益為中心的外交模式及其思想³。不過，只是到「威斯特伐利亞和平」（the Peace of Westphalia）之後，尤其是在十八世紀以後，「國際關係」或者「國際政治」才真正成為西歐地區普遍存在的景象。

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條約」的簽署，是歐洲乃至世界近代史上劃時代的事件。中世紀羅馬教廷曾經長期以專制方式支配歐洲各國的宗

教和世俗事務，導致越來越多的不滿和反抗。十七世紀初西歐和中歐爆發了一連串反抗教會專制、要求改革的抗爭或反叛；著名的「三十年戰爭」便是這種情緒的集中表現。「威斯特伐利亞和約」實際上是各方的一種妥協，它意味著羅馬教皇對各國要求主權的世俗力量作出了某種讓步。和約的中心思想簡單明瞭：一塊領土上的統治者可以決定該領土上的宗教；換句話說，那時的主要事務（或者說權力）——宗教——要由各國的當權者，而非外部的權威（不論是宗主國的國王或梵蒂岡的教皇）來決定；在每一塊領土上不再有多重的效忠和權威，而只有一個，即對統治者的忠誠。到了這時候，近代民族國家的要素已初露端倪：人民（people）、人民居住的領土（territory）、擁有統治人民和領土之權威的統治者（ruler）或者政府（government）。這個統治者或政府也被視為國家的代理人，國家則是為享有主權這一特殊地位的法律實體。「國家」（state）這個詞出現於十六世紀後期，它源於拉丁語「status」，意指統治者的職務或位置^④。

「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詞，據說是由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在十八世紀創造的，它與「民族」的概念尤其常聯繫在一起^⑤。在當時的西歐，小國諸侯和公國君主開始有一種普遍的追求，即逐漸把同一種族的所有人口納入到單一的民族國家中去。法國（France）要把整個法蘭西民族囊括；英格蘭（England）想涵括全部英格蘭人；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則應包含蘇格蘭（Scotland）、威爾斯（Wales）和愛爾蘭（Ireland）。相形之下，中歐和中南歐則落後一些：這時的德國尚不是單一民族國家；義大利亦依然處於分裂狀態。

隨著民族國家的發展，出現了民族主義（Nationalism）現象。最早的民族主義基本上是同一民族（可能居住地域不一）的人們的一種認同情感，它令對本民族的忠誠高於對其他任何民族的忠誠；「不論是好是壞，是富是貧，這是我的祖國。」早期的民族主義有其一定的正面意義。在教會的權力日益式微，中世紀的社會維繫繩索分崩離析的情況下，它發揮了凝聚民衆、團結社會、建設新國家的功用。尤其在法國革命之後，隨著政治和經濟改革的發展及其成效，公民們越來越傾向將民族國家當作一種創

造進步的因素。試想：一個普通人，不可能去控制世界經濟的進展；他不可能影響從自由主義到社會主義的各種意識形態；他同樣不可能管理日益強大的技術創新動力。但是，他能夠理解被政治家和報章通俗媒體表達出來的民族主義，他相信自己是其中的一個成員（從足球比賽時情緒的「一面倒」到贊同政治家的某次演講），認為自己與這一羣體的關係完全不同於與其他任何羣體（國家）的聯繫。民族主義「硬幣」的另一面，則是每個民族成員能夠感受到他與其他民族之間的差異性。十八至十九世紀的其他重大現象，從工業主義革命、意識形態號召到技術進步浪潮，都無法與民族主義的巨大覆蓋和動員力相比較。從義大利到德國，從西歐到中東歐，從最先進的歐洲國家到「最野蠻」的斯拉夫區域（包括奴隸制度和封建軍事結構的最頑固堡壘沙皇俄國），到處出現了爭取民族自立、民族解放的運動，以及民族影響力的擴張和民族生存空間擴大的「民族要求和民族利益」。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由此發現了利用民族主義的巨大潛力。民族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民族間的疏離感（不用說敵對或競爭意識），成為從近代到今日國際政治學主流學派用之不盡的啓示源⁶。

以實際標準衡量，十九世紀已是成熟的「現代世紀」。在西歐以及北美，這是一個現代民族基本生成、民族意識徹底覺醒的世紀；是一個主權國家相互承認和多邊交往的世紀。它尤其表現為歐美列強主宰國際權力分配的世紀；是主要強國對外擴張和征服、弱小國家依附大國強國的世紀；是「血與火」、「戰爭與革命」、「爭取主權和對外殖民」的世紀。然而，國際關係的成熟又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一個由比較低級階段朝比較高級階段的移轉歷程，它表現在 1848 年西歐民族解放運動向中南歐不同方向的不同擴張上；表現在歐洲獨立過程中向北美及其他一些大陸的不同速度的延伸上；表現在帝國意識在不同列強的不同膨脹程度上，即「現實政治」（Realpolitik）的外交思想和戰略比較進步的民族在接受廣泛性上（從不同主張的政治家到各個階級階層的態度——例如，英帝國的上層階級階層和平民百姓，往往比北歐和東歐地區的人士更執著更「熱情」地支持政府的擴張政策）。然而，整體來看，發源於西歐的國家政治體制和國際政治關係已經邁向了整個世界，「獨立」、「自治」、「主權」、「民

族性」、「外交」、「民主」、「自由」以及「人權」等觀念的發揚，逐漸成了全世界多數國家了解和認同的概念；以歐美為核心的國際關係基石已被牢固奠定。

國際關係到近代之成為可能，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拙著《當代國際政治析論》裡曾經指出：加速並且加強各種文化和民族之間的互動、推動同質或異質文明的融合與衝突，是科學技術對國際關係的一個貢獻。「世界上有數千個民族和種族，更有難以數計的特質文化。然而，若非藉技術手段，各種文明之間是無法溝通的。地球表面 70% 的面積為浩瀚的大海所覆蓋，其餘 30% 的陸地除有部分平原外，遍布著高山、叢林和峽谷。在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首航美洲大陸以前，人們並不認為地球是一個圓形，更不了解各種民族和文化間的差異，也就更遑論文明之衝突或融合了。不同地域、膚色、人種之間的接觸和認識，乃一長期而艱難的歷程。」僅僅到了近代的西歐，隨著蒸汽機的發明和航海技術以及其他技術的改進提昇，在接觸了異邦、異地之後（包括各種征服、掠奪），比較先進的民族才有「我是誰？」「你是誰？」、「為什麼彼此不同？」的疑問和意識，才有可能產生具真正意義的國際政治⁷。

第二節

國際政治學的思想軌跡

歐美有些專門研究近代國際政治思想史的學者，將這一過程在本世紀以前的發展演進，區分出兩個階段⁸：

第一階段是某些基本概念的出現，時間大約是十六世紀左右。這是一個從中世紀（the medieval era）邁向近代（the modern era）的時期，是工業革命和文藝復興的各種新發現改變了世界地理和歷史傳統戒律的時期——在空間上向新大陸（北美）推進，在時間上則挖崛了古代希臘羅馬的珍貴遺產，如重新發現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作品之價值。在這一時期，宗教改革的興起也同時動搖了中世紀賴以施行的戒條的觀念基

礎。十六世紀同時是技術革新、經濟變遷、權力世俗化和地理大發現的世紀（所謂「槍炮、船艦和印刷術風行的世紀」），是大西洋地區征服世界其他地區的開始。也正是在這個對西方人來說「騷動不安和激勵人心的世紀」，使得「國家」（state）、「主權」（sovereignty）等現代國際關係的關鍵概念有了其最早的世俗定義。其對後世有重大影響的思想人物，主要有義大利人馬基維利（Niccolo Machiavelli）等。

第二階段是對這些概念做更廣泛、更深入、更綜合的探討，時間跨越了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末。這兩百年是歐洲國際體系奠定和進一步擴展的時期，是常備軍、稅收制度、官僚科層結構建立和完善的時期；是革命、抗爭、衝突和征服等各種口號風行的時期；是秩序（order）、理性（reason）、契約（contract）等現代觀念逐漸深入人心的時期；是各種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空想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 [Social Darwinism]、民族解放理論、天賦國家權利論、科學主義和工業主義至上論等）流行泛濫的時期。從對國際政治關係研究的啓示看布丹（Jean Bodin）的現代主權理論、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狀態」說、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勢力均衡評論、康德（Kant）的「永久和平論」、黑格爾（Hegel）的國家學說、克勞塞維茲（Carl P. Clausewitz）的國際衝突觀、霍布森（J. A. Hobson）的帝國主義理論，以及馬克思（Karl Marx）的某些觀念，還有一些較不知名的思想家的著述，以之相對於當代國際政治理論體系而言——零散而深刻、廣泛但不具系統的方式，為二十世紀國際政治學的形成提供了充沛的思想泉源。

沿著這條軌跡，下面，讓我們作略為仔細的探討和介紹。

□ 中世紀晚期對修昔的底斯的重新發現

如同許多學者早已指出，嘗試著說明國家間關係的性質由來已久，其中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中國和希臘⁹。在西方，柏拉圖（Plato）和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這方面有一些最早但非常粗略的見解，其線索可從所謂「理想國」的等級秩序到國家行政事務（包括彼此

間交往事務)的管理上可見一斑。但是,以國際政治的角度而論,真正對中世紀晚期的反抗思想和文藝復興以後的新思想產生重大作用的,首推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的底斯及其不朽作品《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據專家們研究,在中世紀後期(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前期)歐洲的某些地方,曾經出現過「重新發現修昔的底斯」(rediscovering Thucydides)的思想探索過程¹⁰;它與新一代的學者們重新評價古典理論的風氣相連接,其主要發源地在義大利的一些城邦。那時的人們彷彿突然發現:在記錄古代海上強國雅典(Athens)與陸上強國斯巴達(Sparta)的交往、衝突和戰爭,及其原因和性質的時候,修昔的底斯既討論了強者如何以強者風範行使強權、弱者如何接受了他們不得不接受的東西;也分析了一個野心勃勃的強者如何可能被弱小者的聯盟所遏制的現象。他的編年史不是一般的大事記,而是戰役與圍攻、聯盟的形成與破裂、戰爭狀態對民衆的影響(「人類精神的被侵蝕」)等重大現象的精心編纂;他探討了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政治領導人的性格及影響;他的關於古代希臘城邦國家之聯盟政治和戰爭狀態的研究十分適合分析中世紀後期義大利各城邦的關係;他被看作是歷史學家中第一個記載了民族間戰爭的政治和道德性質的人。歸根究底,「重新發現」浪潮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修昔的底斯的作品及作者本人的主張,在氣質上特別符合文藝復興時代的風格與追求¹¹。

文藝復興運動的這一傾向主張及評價,一直持續綿延到了今日。在當代國際政治學界,人們普遍把修昔的底斯作為這一領域最偉大的先驅。布爾(H. Bull)教授評價說:如果要說古代有研究國際關係的著作,那麼其歷史至少要與修昔的底斯的這一作品一樣古老¹²。懷特(H. Wight)教授更認為:在國際政治研究領域中,古代西方留下的文字內唯一能與那些政治哲學家的不朽經典相提並論的著作只有《伯羅奔尼撒戰爭史》。¹³霍夫曼(S. Hoffmann)教授將此書列為兩千年來關於國際關係分析的三部偉大經典之一¹⁴。一位專門研究《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人士概括道:以現代觀點來看,修昔的底斯論述了古代城邦間政治鬥爭的規律,分析了古希

臘人如何在「既定的歷史條件和政治機構下」巧妙地維繫和管理彼此間的複雜關係。這一遺產帶給近代以來的所有國際問題研究者，特別是當代國際政治學的「新現實主義」學派予重要的啟發。

二 馬基維利的「君主論」及其思想影響

從歷史觀察，歐洲中世紀晚期最重要、最具革命性的思想家，當屬義大利政治哲學家馬基維利。這個佛羅倫斯人同時還是外交家和歷史學家，在其大量著作中最具影響的有《佛羅倫斯史》（*History of Florence*）、《戰爭藝術》（*On the Art of War*），以及特別是《君主論》（*The Prince*）等作品。他試圖從歷史事件中發現政治的規律和作用方式；他發展了一種理性、自我利益為中心的概念；他在研究君主與臣民的關係時，將權、術、勢的實用主義政治觀推向前人未曾有過的新階段。他出生在中世紀的崩潰年代，目睹了教廷及其教規教條的嚴苛對個人權勢施展的束縛和對國家政權有效治理社會的不利。作為一個文人主義者，他相信學術家對歷史的分析有助於政治家對現實的統治；作為一個現實主義思想者，他相信「好的」統治者應當是只根據自身的最大利益行事的人。

在《君主論》裡，他竭盡所能地向統治者建言：沒有比當權者自己更高、更重要的利益和追求；君主是國家的代表和化身；為了國家的利益從而為了社會的福利，君主應當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甚至不惜食言和施暴；出爾反爾不一定是壞事，正如信守承諾並非絕對好事一樣，關鍵在於它們是有利還是有害於君主的統治和國家政權的鞏固。政治，尤其是國家間的政治，有一種與普通人理解的道德不一樣的道德；政治的道德就是君主及國家按照自己意志有效地治理臣民和社會。他對義大利諸君主諸侯的忠告是：義大利是能夠統一、更加強大和抵禦外來的任何干涉的，關鍵在於君主們自己有什麼樣的統治能力；這種能力不是他人（例如教皇）賦予的，而是一個統治者世俗的本領——意志、力量和狡詐。考慮到時代的背景，馬基維利的忠告無異於敲響中世紀末日之鐘——一個美國學者評價說：「這種狡詐所表現的不是別的任何東西，它是現代歐洲民族解放的第